

大一统理念的提出

西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汉武帝刘彻诏令各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就国家内外大政问计于天下英才。彼时汉朝政局走向恰处于变动的拐点。就在上一年，一贯主张以黄老之术治国的太皇太后窦氏刚驾崩，同时围绕是否出兵百越安靖边疆问题，汉武帝与淮南王刘安进行了一场激烈辩论，强调“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印治”，这两件大事无疑引发了刘彻对未来如何调整与构建西汉王朝“天下”秩序的深沉思考。

况且经历过几代帝王的开拓与发展，至汉武帝初年，国势已今非昔比，据《汉书·食货志》载，“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犂耜者瑳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道而黜愧辱焉。”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便意味着自汉初所制定的旨在巩固统一、与民休息的国策业已完成，下一步如何基于既有的执政实践，因时因势而变，拟定新的治国方案迫在眉睫。申言之，治术的调整必然会引发治道的变更。汉武帝求国策于贤良，可谓顺势而为。

于此次君臣论政中，广川大儒董仲舒脱颖而出，其所提供的政治纲领“天人三策”为之后汉武帝进行国家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也给后世留下了治国之范本。在这篇著名政治文本的末尾，董仲舒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该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于是这一理念由书斋进入了庙堂，升格为规范主流思想与国家治理的核心原则，具备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统驭的双重



涵义。

综合而言，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既是对先秦以来有关学说的承袭，可谓渊源有自；同时经他个人发挥，加之汉代之推崇，被后世王朝奉为圭臬，堪称影响深远。

大一统思想贯穿中国历史

纵观五千多年中国史，大一统传统之形成与完善，大致经历了五个重要阶段：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及明清。漫长的先秦时期是大一统的滥觞期。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最初由炎黄二族演变而来，他们原是古代两个部族，在长期交往中结合为一体。《楚辞·天问》有云：“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炎族的图腾龙背负黄族图腾熊出行，说明两族已高度融合，“炎黄子孙”遂为中华民族大一统之象征。进入商周时代，礼乐文明逐渐发达，这为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奠定了必要的文化基础，《诗经》里面所宣扬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即是最生动的体现。降至春秋战国，周王室衰落，礼坏乐崩，诸侯林立，天下苦乱久矣，反而催生了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

“大一统”三字的最早出处。大，意指尊崇；大一统，即尊崇一统。后来儒家几位重镇皆延续该理念，如孔子盛赞齐桓公和管仲“一匡天下”，孟子力主“天下定于一”，荀子追求“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振动从服以化顺之”，都是在倡导一统天下的主张。最终，由崇尚法治的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为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确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基础——官僚制与郡县制。如此看来，董仲舒“大一统”理论的学说渊源和制度样本无不是来自前人。

自汉武帝将“大一统”纳入其构建王朝治理的实践后，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历朝无一不将之贯通于治道的因革损益与治术的进退消长之中。

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政治动荡与民族交融，隋唐终于再度实现了国家统一。在如此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大一统思想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经过反复的双向碰撞和互动，一方面改变了既往的以“大一统”为主要内容的天下观，开边疆族群入主中原成为“天下共主”之先河，而边疆族群入主“中国”促进了边疆地区尤其是北疆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凝聚。与此同时是突破了“严华夷之辨”的界限，使得唐代在以唐太宗

为代表的统治者心目中“华夷一家”的观念成为一种重要的“治国”理念，“天下”可以是华夷共同参与治理的“天下”。故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正是该时期大一统思想的新特征。

与之配套，隋唐君主在制度设计上也无不围绕大一统展开。如在中央决策机制层面，唐代设立三省六部，通过制度程序与刚性律法，来约束之前渐趋泛滥的皇权，从而保证决策的合理性；在人才选拔层面，隋唐开创科举制，为广大庶族子弟开放政权，从而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可以更加顺畅的互动，保证权力可以下沉到最基层，而且获取功名的士子作为乡绅享有参与地方治理的资格，成为稳固大一统局面的最敏感触角；此外当时尚有隋时疏浚开凿的大运河，这不仅加强了齐鲁、中原地区与江南地区的文化交融，历经千年更把汉唐的长安、洛阳，两宋的开封、杭州和金、元、明、清的北京为首的文化中心联为一体，以这种独特的交通方式使各区域文化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

两宋、辽、金、西夏时期，政治版图上的“大一统”局面虽不复存在，但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一统理念依然主导着各并峙政权。宋是以汉人为

主体所建的王朝政权，统治者多将辽、金、西夏视为蛮夷之地，所以宋儒更多用力于阐述与彰显《春秋》一书中“尊王攘夷”思想。辽为契丹人所建政权，自称“辽之先，出自炎帝”，因此为“中国之北朝”。金由女真人建立，同样自称为中华正统，所以海陵王完颜亮明确表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

元朝结束了晚唐之后长达近五百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主导的全国性大一统政权。元世祖忽必烈秉承大一统思想，依据《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大元”。元朝统治者在地方设立行省、中央设置宣政院，并提出“天下一家”思想，推动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强化了华夷一体、天下一统的整体观念。可见虽政权纷立，然大一统思想已深入人心。

明清时期，大一统已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要义。明太祖朱元璋称“朕即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之如一”。无独有偶，清雍正帝自命“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并且将该理念成功灵活地运用在处理边疆民族关系和多元文化当中。清人对西藏和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及文化习俗，深入了解，精心谋

划，诸如采取“金瓶掣签”、满蒙联姻、盟旗制度、内外札萨克、王公封爵、驻藏大臣、回疆伯克制、改土归流、避暑山庄外八庙、木兰行围等政策，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可谓成效卓著。

即使到了近代，传统政治制度的优势在西方冲击下逐渐衰减，但大一统思想依然在众多仁人志士的救国方案中不断被唤醒与重塑，实现了近代语境下的创新与转化。康有为、梁启超发出“保国、保种、保教”的时代呼声，其主旨就在于维护“大一统”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存续。孙中山无论是在革命前期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目标，还是后来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都蕴含着“大一统”的思想内涵。面对日寇侵略，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号召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华人要团结为一个整体，同仇敌忾，共同对抗帝国主义侵略者，并建立各革命阶级共同参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又建立起由各民主人士共同参与的革命统一战线。这都是大一统思想在近代的延续与发展。

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

五千年中国史，大一统贯穿始终，延续不辍，代有递嬗。虽然具体的政治制度不断更迭，但其背后蕴含的制度精神内核之一的大一统思想却不曾泯灭，这也启示着后人要善于秉持辩证的态度去继承古代中国制度文明的遗产。要之，大一统传统早已跃出政治实体视阈，升华为一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熔铸于中国人的心理和行动中，内化为中华民族内心强大的文化信仰和政治使命。该传统不仅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而且对于维护当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进行制度设计与创新，仍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治理思想

汉武帝『以强制强』经略北疆

丁涛

中华春秋

汉武帝凭借“文景之治”积攒的国力，将战略重心设定在了可影响全局的北防匈奴上，历经数十年征战，逐渐将对匈奴的战争推向外线，通盘考虑加强对辽东、河西及西域沿线的军政介入，达到了断其左右臂的战略目标。在接连几场大战之后，稳固东线、夺回河南及打通河西走廊、割裂诸羌与匈奴联系等，大大压缩了匈奴侵扰的活动范围和规模。此外，汉武帝时期史无前例地开拓出了一条集国防、贸易、文化交流等为一体的“丝绸之路”。

着眼于消灭对方有生力量

汉高祖“白登之围”后，汉匈关系多以和亲、互市等手段维持了大面上的平稳，但匈奴对汉边的袭扰仍然不断。至武帝时国力达到鼎盛，为确保完全的安定，从最初两军侵袭与反击的对战，到大军团迂回作战战法的成熟，汉武帝逐步摸索出以战止战、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并将之远逐的战略路线，破除了长久以来首府长安的安全压力，大大地拓展了疆域，将汉廷影响力远播西域。

首先，由政治和亲向军事打击调整，不再单方面委曲求全。元光二年（前133年），借匈奴再次请求和亲之机，武帝定下奇袭围剿之策，用雁门郡马邑为饵，诱使匈奴以10万骑兵来袭，欲以5路大军、30余万人，歼灭其主力而毕其功于一役，但因雁门尉史意外被俘、泄露军机，加上汉各路大军协调不力，“马邑之谋”最终“流产”，就此拉开双方长达数十年战争的序幕。此后，汉军开始稳中有进，逐渐扭转被动局面。着力稳固雁门至右北平一线防务，针对匈奴多次袭扰，调配重兵于上谷、代、渔阳、云中等郡，作为发动反击的策源地。部署停当后，元朔二年（前127年）遣卫青、李息兵出云中至陇西作为奇兵，攘除盘踞河南的楼烦、白羊王。随即又使苏建兴10余万人营建朔方城、修缮边塞，作为守护河套地区的中坚。同时针对匈奴采取连续报复行动，元朔五年（前124年），卫青统领汉军3万精骑，以4路大军出朔方、李息及

张次公兵出右北平为策应，取得了俘获“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的辉煌战绩，至此清除了右贤王势力，为下一步经略河西创造了条件。

其后，汉军开始主动出击，反击匈奴的同时，打通了河西走廊，并积极寻求与单于主力决战。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领万骑出陇西，“历五王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获首虏八千九百馀级”。当年夏，霍去病再次率军逾过居延、小月氏至祁连山，虏获单桓、酋涂王等以及收降2500人，斩首3万余级，逼降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等4万余人，从此陇西、北地、上郡少遇匈奴侵袭。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领5万骑兵，步兵及运送輜重等数十万，分出定襄、代郡，向大漠深处进军，卫青遇到匈奴主力，以左右翼包抄，单于退走，虽未追及，但取得了“捕斩首虏万九千级”的战果。霍去病率部出代郡、右北平2000余里，“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虏获七万四百四十三级”，此后“幕南无王庭”，西汉王朝得以在朔方以西至金城郡，广设屯田，而西域道路可通，就此掌握了对匈作战的主动权。

构筑完全的安防体系

汉武帝一朝对匈奴长年用兵，战略战术方面根据战事推进和战场变化，进行相应调整，如起先夺回河套地区、征战河西、漠南漠北，多独任兵法采取“大迂回”“大纵深”方式推进，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将政治、经济与军事手段相结合，此时军事行动便有了以战养战的特点，历十数载经营，使匈奴的活动范围被牢牢挡在塞外乃至漠北，已很难组织有威胁的侵边行动。在经略西域方向上武帝一朝甚至是“超额”完成任务，“点面结合”将西域诸邦纳入并构筑王朝总体安防体系，使外患压缩到最小。

首先，精准把握地缘情势，正确选取主攻方向。往前追溯，匈奴传

至冒顿单于时，完全侵占河套地区，活动范围西起云中、定襄、雁门，东至右北平、辽西、辽东，其势力已深嵌汉廷北疆一线，中路威胁直逼长安。为此，汉武帝选择从边患最烈且距离单于王廷最近的云中、定襄、雁门等地切入，以东线为策应，采取大迂回的方式迅速推进至高阙塞，割裂白羊、楼烦二王与匈奴腹地的联系，奇袭防御空虚的河南地，一举解除腹心之患。需要指出的是，汉武帝在以武力驱逐匈奴势力的同时，极为重视沿线边塞的开拓稳固，除增加必要国防力量外，还极大促进了经济开发。元朔二年（前127年），收复河南地后，当即做出营建朔方、五原的决定，当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实边；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取得河西之地，随即设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元狩三年（前120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而增置张掖、敦煌二郡，再次徙民实边；元封三年（前108年），武帝氏人起事，平定后将民民众分徙酒泉郡。

然后，极力拉拢西域诸邦加入反匈行列，以求“断匈奴右臂”，彻底清除匈奴影响，促成对整个西北地区的安全掌控。武帝对西域的关注，最初目的是联络月氏共同制衡匈奴，时为郎官的张骞在建元二年（前139年）首次出使西域，至元朔三年（前126年）返回，详细汇报了亲历见闻，更是激发了武帝经营西域的雄心。漠北会战后，匈奴大幅向西北方向退却，随着河西四郡的设置及持续巩固，为凿空西域提供了有力保障，于是张骞再次提出联络乌孙攻击匈奴的建议，获得了武帝大力支持，命其率领300人的使团，携带万头牛羊及数千巨万的财物向西进发。尽管乌孙因内部政局动荡及其与匈奴关系密切，对与汉廷结为兄弟之国存有疑虑，但乌孙使者跟随张骞返回时，感受到了汉朝地广人众与物产丰饶，其他汉廷使者也奉命与西域各国广泛接触，增进了相互了解，为后续深度经略并建立官方往来关系打开了局面。



积极寻求国力与军力的匹配平衡

汉武帝在决计对匈奴发动反击以降服之时，遇到了来自各方的阻力，几乎在每个战略推进阶段，都有不同的声音，武帝于此并不是全然不理睬，而是在积小胜为大胜上下功夫，用取得的战果来说明其“以强制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当然过程当中也确实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纵观中华文明历史发展，以武力征讨“四夷”特别是对北疆的进取，奠定了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及疆域规模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展现出武帝一朝的国防动员力也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首先，敢于打破汉高祖以降确立的和亲政策。在与匈奴的较量中，逐步摆脱主和派的“陈词滥调”，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促成了朝中颇具影响力的主父偃及公孙弘对匈奴作战态度的转变。元朔元年（前128年），时为平民的主父偃上书，以秦皇汉祖对匈奴作战均以失败告终为例，劝谏朝廷不要兴兵匈奴，获得武帝称赞。次年，汉军成功夺取河南之地，主父偃则提出“河南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漕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积极建言在河南地营建朔方城。元朔三年（前126年），时为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对“通西南夷，东置

沧海，北筑朔方之郡”的举措提出异议，认为这是“疲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武帝没有正面否决其议，而是让朱买臣等人围绕置朔方城的利弊与公孙弘对策，公孙弘均不能作答，以至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粗鄙和短视。与此同时，武帝也欣然接受了其“专奉朔方”的提议。

其次，武帝对于战争所带来的巨大耗费是有清醒认识的，并对此竭力筹措以弥补之。事实上，在夺回河南地、营建朔方城时，就出现了“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的情况，至元朔六年（前123年）因连续出动10余万大军反击匈奴，汉军受赏花费黄金20余万斤、士马死者也达到了10余万，加上兵甲转输运送耗费，使得用度枯竭，于是武帝下诏使“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借鉴文景时期一定限度的售卖“武功爵”做法，以赏禄激励将士。随着战事的深入推进，至元狩四年（前119年），匈奴远遁漠北后，汉廷也遭受了较大损失，尤其是作为战略储备的马匹损耗巨大，以致“不复大出击匈奴”。此外，还出现了“富商大贾或踰财役贫，转穀百数，疲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的情形，武帝开始下诏陆续采取更易币制、恢复盐铁官营、抽取商税等举措，很快便取得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明显效果。